

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文库

杨德泉文集

YANG
DE
QUAN
WENJI

杨德泉/著



三秦出版社

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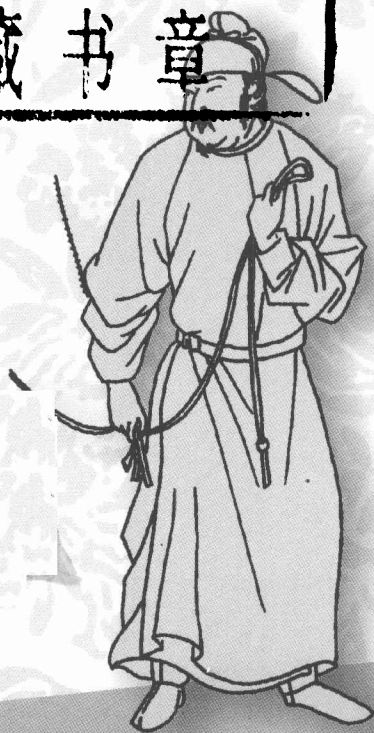
杨德泉文集

YANG
DE
QUAN
WENJI

杨德泉/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杨德泉文集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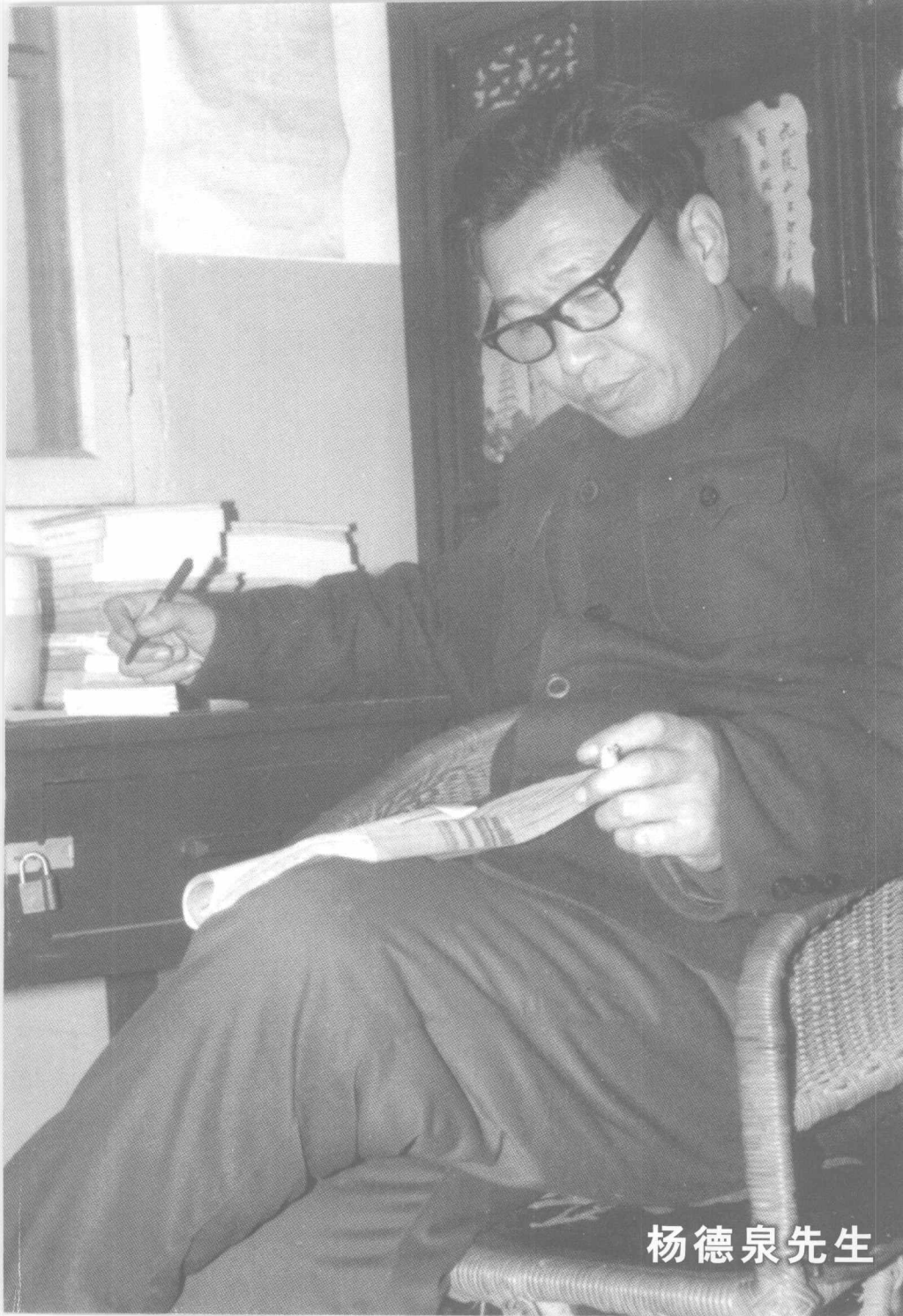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2 插页 347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46-616-5/K·191

定价: 13.90 元



杨德泉先生

杨德泉 (1934.3.14~1991.2.12)，原名杨清森，笔名侠夫，陕西蒲城人。1951年至195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1955年至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1958年9月至1970年10月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中文系任教。1970年11月至1978年6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文教局、县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6月至1985年12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任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12月至1991年2月任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主任。1987年评为研究馆员，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德泉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绩斐然，著述颇丰，并担任中国宋史学会理事、陕西历史学会理事等社会学术团体职务。

目 录

史念海教授序	(1)
斐汝诚教授序	(4)
韩伟研究员序	(8)
从《太平广记》一书中看唐代市民等级的活动、特点及 其历史作用	(11)
唐代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	(26)
唐代有纸币吗?	(113)
唐宋行会制度研究	(116)
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	(159)
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	(179)
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及其经济社会效益	(195)
试谈陈旉的《农书》	(222)
从《夷坚志》看宋代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	(242)
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	(254)
试论清初旗地的形成及其性质	(286)
《宋史·张浚传》质疑	(306)
张浚事迹述评	(317)
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	(351)
试谈宋代的长安	(375)

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	(393)
陕西在宋代的历史地位·····	(420)
对中国农民战争发展规律的初步意见——编写《中国十 大农民战争史》(初稿)的几点体会·····	(445)
也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区别和联系·····	(453)
《义龙村修城碑记》——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拾零·····	(474)
宋人治学杂录·····	(476)
宋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	(482)
后 记·····	任鹏杰 (492)

史念海教授序

德泉同志捐躯后两年有余，海始执笔为其文集作序，感念前尘，往事历历，质疑问难，如在目前，为之泫然无已。

德泉同志多年来皆从事高等师范教育事业，主讲大学教席，兼致力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于历史研究，锲而不舍，无时或已。虽间亦从政，然始终未能偶一忘情，稍有余暇，即执笔撰述，未尝片刻暂息。犹忆其卧床不起，病已垂危，海前往探视，见其神情如旧，依然不断以学问相质询，仍间出新意，超乎侪辈之上。而意态纵横，驰骋不休，时欲扶床强起，思有以见于笔墨。其强项之状，迄今每一念及，辄涕零不止。

德泉同志早年就读，即已嗜乙部载籍。其后专攻宋史，尤其对宋代经济多所留意。其所钻研，并非偶然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欲究其间的得失，以期有助于当前的建设。宋代继踵隋唐，亦颇有所改革，往往与其前朝迥异。论者间有习焉不察，辄因循旧式，强为论述，故难免凿枘难通，不易索解。其实博览群籍，旁搜远绍，还是可以得其真谛的。德泉同志对于宋代城市的钻研，就是具体的例证。

我国历代王朝对于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及其建设，莫不博采众议，殚精竭思，期其亿万斯年，百世不坠。秦都咸阳，汉都长安，近在咫尺之间。后汉魏晋虽以洛阳为都，至于隋唐却复归于长安。长安再经隋唐经营，其规模的宏大，并世诸国殆皆未能与之相匹敌。洛阳位于穀函之东，距长安稍远，其间固然

息息相通，所差未为甚多。后汉自仍遵循西京旧规，魏晋依然因袭汉氏前辙。拓跋魏南迁，虽是在废墟上重建新都，前朝遗迹所在，犹可依稀辨认。隋唐以洛阳为陪都，与长安东西并列。隋唐洛阳已非元魏之旧，却仍能循蹈本来规矩，未多改动。唐开元年间韦述撰有《两京新记》，虽已多所佚遗，然断简残篇犹可略见一斑。以之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相对核，里坊之制前后如出一辙。形迹俱在，可以覆按。可见历经数百年之久，建设都城的主要构思所在，都还是一贯的。

下迄宋代，相隔虽非甚久，都城建设就难免间有违异。北宋以开封为都，自是为了有赖于汴渠的漕运，以图消除都城粮食的困难。水上交通较之陆路驿运为便捷，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再加上人为的因素，开封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和隋唐的长安迥然不同。今传世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绘的舟车市桥郭径，其间的繁荣情景，殆非长安里坊中人所可想象的。正因为有这样显著的变化，都城的建设也相应有了改动。唐代长安十二街，如棋盘，如菜畦，方方正正，东西两市分列两侧，皇城官城和外郭城依次罗列，颇具规模。宋代的开封却不是这样。开封城内外三重，最内的为皇城，皇城之外即为臣民居地。这本是五代以来的旧规，入宋以后，复有外城厢制之设，成为三重城。后来由于工商业发达，人烟密集，三重城池还容纳不下，因又特置厢吏，以统辖都门外的居民。前后差异若此，论者尚欲以古人所说的“日中为市”和“前朝后市”作说明，宜其扞格难通，与实际不相符合。北宋开封已和隋唐长安不尽相同，南宋临安更有新的发展，自难依样葫芦，企图作出新的解释。德泉同志为此指出：“对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研究，不过是对于当时城市‘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

外来成分’。只有依据丰富的史料，对于宋代城市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如实地还它的‘本来面目’，正确的结论就自然不难得出来了”。德泉同志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大量汇集宋人及其后来者对于开封和临安的记载与论证，作了新的研究。德泉同志本来就擅于博览群籍，因而征引史料靡有孑遗，只要能够得到有关的史料，莫不备加采撷，至于力所不及之处，那是应另当别论了。由于广征博引，立论就皆有确据，也就能引出新意。这是耳食皮相者所难于攀比的。

德泉同志论述宋代城市的发展，开封、临安的繁荣自在首先论述之列。一般性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中小城镇的普遍兴起与繁荣也在所不遗。特别是中小城镇的兴起在宋代是和前代不尽相同的另一种现象。直到现在，全国已有许多的工商业城市，至于中小城镇更是屈指难数。促使这些工商业城市愈益发展，中小城镇愈益普遍，仍为当前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追溯渊源，德泉同志已经导夫先路。德泉同志不幸作古，深愿后来者继续努力，不仅完成德泉同志的遗愿，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也可以先后致力。

德泉同志对于宋史的研究，城市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在货币、行会、商税、盐法、农业、水利以至于农村经济各方面都曾作过深入的探索，而且都能道出新意。德泉同志这些研究，也和城市研究一样，并非都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当前国家的建设。无奈天不假年，德泉同志未能了其宿愿，赍恨而歿，这是永难弥补的憾事。当前国家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为并世各国所称道和羡慕。德泉同志地下有知，当亦欣欣于其研究所得之能见用于世，而含笑于九泉矣。

史念海谨序。时在一九九三年秋月。

裴汝诚教授序

杨德泉同志的论文集，在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支持下，由他的弟子任鹏杰同志收集整理，今天奉献给读者了。此时此际，我作为德泉的老同学，既喜悦又悲恸。喜的是，这本 30 多万字的论文集问世，使我国史林又添佳作，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德泉也可以欣慰于九泉之下；悲的是，比这本集子更多的文章未能写就，才华未能尽展，他就与世长辞了，损失重大，难以弥补。

德泉同志在做人做学问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们是 1955~1958 年一起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毕业前夕，有两件事是我终生不忘的。一件事是在当时的运动中，由于他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我免受了批判。这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是极其难得的。第二件事是，毕业分配方案只给陕西下达了一个名额，德泉来自陕西，当时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最有条件到西安工作，可是他得知同班一位年近 30 岁的外地老大姐刚经人介绍了一位在西安工作的对象，便毅然决定与另外一位来自西安的男同学把这唯一的名额让给了老大姐，让她喜结良缘，自己却到了远离家乡的扬州工作，把困难留给了自己，将方便让给了同志。

70 年代初期，他回到家乡陕西蒲城，生活陷于极端的困苦之中。为了节省一文钱，他要拉着车到几十里地外挖煤、拉

煤，路途要经过几道山坡，负重下坡屡历惊险，曾几次因为腿部颤抖险些人倒车翻，横尸路上。为了节省一文钱，他不买面粉，而是买麦自己磨粉，养活双亲和子女。这种艰难的日子，只有他的贤内助理解并全力帮助他。令人敬佩的是，这般艰苦的日子，不但没有吓倒他，相反他却更坚强了。他坚信，环境终究要改变，一定能够重返讲坛，从事酷爱难舍的史学研究事业。真是一位钢铁汉子，百折不挠，贫贱不移！

1987年，他弃官从学，重返高校，再执教鞭。由于他走过前面一段坎坷路，由于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所以就把全部爱心奉献给了学生，他殷切希望学生们成长为国家栋梁，对学生关怀备至，要求严格，悉心指导他们从事课题研究，受到学生的由衷爱戴，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在他病重的日日夜夜里，是学生侍候左右，在弥留之际，他呼喊的是学生的名字。他去世后，学生写了很多挽联沉痛哀悼敬爱的老师，其中一联曰：“梦聆教诲犹亲切，醒恨苍天独泪涟。”多么珍贵的师生情谊！

1986年，他服从国家需要，奉调筹建现代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出任筹建处主任。宏伟的工程，重大的责任，像磁石一般吸引住德泉，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数年如一日。当筹建工作即将告成之际，万恶的肺癌袭击了他。在手术台前，他写了一生中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真想大哭一场！我去西安看望，他又说：人终有一死，遗憾的是筹建新馆的工作尚未完成。他笑迎死神的挑战，无所畏惧，但挂念的是未竟之业。多么高尚，多么令人崇敬的好同志啊！我引以为光荣和骄傲！他患病后受到组织和同志的极大关怀，得到了最好的治疗，而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以

惊人的斗志和毅力向病魔展开搏杀。最终虽弃我而去，但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德泉同志酷爱历史，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他在治学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点：

求知如饥似渴。还在读研究生时，他景仰漆侠先生，曾千里迢迢到天津向漆先生求教，闻教之后，他说胜读十年书。从此他就作了大量资料卡片，读书更加认真，并且笔耕不辍，着力于唐宋经济史研究。他的《唐代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唐代有纸币吗？》、《陈旉及其农书》等佳作，都是积累于这次天津之行后，反映出扎实的基础和锐意求新、不囿旧说的创新精神。

善于充分利用所在之地的条件，因时因地搞研究。他曾和我说，既然在扬州教书，就要从扬州的特点出发搞研究，并说已经收集到有关两淮盐业的许多资料，其中不少是前人未曾发现的材料。于是撰写了《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他在西安工作时期，撰写了宋代长安、北宋关中的社会经济和陕西在宋代的历史地位等论文，揭示出陕西不仅在汉唐重要、发达，就是在宋代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发前人之未发，成绩蔚为可观。

注重从实践学习，持之以恒。他研究唐宋行会制度是从50年代就读之际开始的，直到80年代才发表，这当中不断充实，不断修改，确实是篇力作，所以该文发表之后，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好评。他已经重病在身的时候，还叮咛他的学生，读书要认真，研究工作要持之以恒，最忌一曝十寒。他曾和我谈到，书一定要读，同时也要从实践中学习。我们的共识是，认真投身于实践，认真观察和总结实践，对于学习和理解书本

知识是有很大帮助的。

求真求实，决不苟同。德泉是位才华横溢的史学家。他的文章，历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见解独到，文采飞扬。真是文如其人。而这些长处，都和他求真求实、决不苟同的学风有着直接关系。他准备撰写有关张浚的文章前，有一次和我展开了争论，从评价到资料，我们都各执一说。虽然我们情谊胜过兄弟，他也决不苟同。不久他写出《张浚事迹述评》和《宋史·张浚传质疑》两篇大作，受到美籍华裔历史学专家刘子健先生和我们尊敬的漆侠先生的高度评价，刘子健先生还邀请他合作撰写文章，发表在原西德《世界史年报》上，在国内外都引起学者们瞩目。他常说，做学问当仁不让于师。是的，德泉一生都在坚持这一思想。但是，他决非自以为是、固执偏见，而是尽量占有资料，分析资料，比较资料，为求真实准确。我从和他长期相处中，确实体会到这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思想作风。

我从做人做学问两个方面，列举出一些亲身与德泉同志接触的事实，当然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优点和长处，我的目的，是借他的文集付梓之际，略抒缅怀之情，寄托哀思。我将永远向好同志、好兄弟、好榜样德泉学习！

裴汝诚 谨序

1992年秋于华东师大

韩伟研究员序

1987年季春，我与石兴邦先生去西安东郊一座医院，探望查体中的一位领导并请示有关法门寺新闻发布会工作。进入病房，即见一位学者风范的长者，与李伟同志正在汇报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中之问题。经介绍才知是杨德泉先生。我知道杨先生曾在陕西师大任教，并是一位有影响的宋史专家，但从未谋面。暂短的探视结束后，四人同出病房。临上车时，杨先生对我说：“早已闻名，今日始得相见，我期待着有一天能一起共事。”

这次不期而遇，并听到杨先生如此率直的话语，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起共事”的邀请，更使我感慨良多。本来筹建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全省乃至全国大事。考古文博界同仁莫不欲尽心尽力，但多次讨论陈列大纲许多人未被邀出席，我也常在其中。事后知道主事者心存芥蒂，争竞细碎，因此凡属历博之事我惟恐避之不及。我常想，这么一座恢宏博物馆的建设与陈列，必须有器识高尚、顾全大局之人运筹，才能善毕其功。杨先生全面主事后，闻者莫不附额称庆，深感事业之有望。此后，我曾在春节期间去拜谒，然而未晤，仅留名刺怅然而返。1990年夏日，我随省政协文物组在渭北一带视察文物保护情况，接西安来电，催促即返。回来后始知已被调往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工作。8月莅事，与尹盛平、李伟等同志，对已往的

陈列提纲做了较大改动，最后完成了《陕西古代史基本陈列大纲》，及陈列设计与实施工作，并公开向国内外展出，得到了高度赞许。这件事让人深感历史辩证法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究其源应与杨先生的举荐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年8月我到任后，杨先生已身患不治之症。在我们日以继夜修改、制订新大纲及付诸实施时候，杨先生住院治疗，身体亦时好时坏。抽空去医院探视，他对陈列进展极为关心，并提出如何使用好设计人员力量的想法，我们都一一照办了。就在历博大厦即将落成之时，杨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痛心疾首，即赴杨宅祭奠，并劝慰家属节哀承志。杨先生虽然走了，但在他身后却矗立起一座巍峨的殿堂，成为今日进行主旋律教育的阵地，也是我国跻身于世界博物馆之林的一通丰碑。他走了，他和与他一道共同奋斗的同志对文博事业的贡献，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这种思念，在陕历博开馆大典上，在平日重大活动时，常常飘过我的心中。所以，当让我撰写《陕西历史博物馆落成纪念碑》时，欣然命笔。其文曰：

“三秦乃华夏故地，长安为千年古都，文物荟萃，人杰地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巡陕，指示建造新馆，以展藏三秦文物。改革开放，百业俱兴，总理遗愿，始得落实。一九八六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工程，国家列为第七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

一九八三年工程设计人员考欧亚之长策，扬汉唐之雄风，取法中外，精心设计。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破土奠基，参建人员沐风雨，犯寒暑，以夜继昼，营缮不辍，尽倾心力，功不可没。历时八载，斯厦厥成。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正式开馆。眺望秦巴，俯视渭泾，殿宇崔巍，重檐切霞，玉砌瑶台，壁素栏华，崇楼四隅，修廊八达，设备精良，规构宏

大，嵯峨殿堂，名播迩遐。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思国之昌者，必兴其教化。斯殿轮奂，功德巍然，堂高十寻，室容万人。听得失废举之戒，察兴衰隆替之因；明教化，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礼义，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华夏宝库，东方明珠，意笃殊深，勒石永志。”

碑文撰成后，即由福建运来大型花岗岩碑材，树立于历博大院之东南隅，准备书丹镌刻。然碑文经上级过目，因属文言文未蒙通过，因此落成之碑至今仍以无字碑供人参观。今移录此文，寄托我对杨先生的缅怀追念，也表示对历博建功立业者们的崇敬。

杨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公直无私，知人善举，莅事惟勤。虽手过亿万，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家无余禄，妻不衣帛。他博涉典坟，详明史乘，励志讲学，从容著述。今收集杨先生耕耘所得编辑成册，付梓刊印，流布后世，以慰先灵。

韩 伟

1994.1.18